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 後殖民批評

• 姚新勇

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進入中國大陸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了^①，相關文字幾乎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漢族主流文學(化)圈^②中的各種後殖民言說，討論的似乎都是中國(東方)與西方的關係，所傳達出來的文化焦慮，大都是在全球化語境下，面對強勢西方力量時，中國性、中國認同與中國文化的危機；即便是那些呼籲跳出簡單二元思維、關注「地方知識」的文章，也僅止於抽象的觀點陳說，並未真正涉及中國內部多族群、跨文化的現實^③。這樣，後殖民文化批評這一高度關注弱勢族群、跨文化交流與撞擊的批評理論，似乎就只有中國與西方這樣的「外部關係」可以解讀，而與中國內部多重文化關係的解讀無關。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後殖民批評也在「少數民族文學」^④界發生了迴響。

一

後殖民主義批評與少數族裔文學批評發生聯繫，雖然開始得比較晚^⑤，而且總體水平也不高，多表現為對主

流學界轉手的後殖民批評方法的再度轉手借用，但是它卻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強的本土當下經驗的在地性。少數族裔文學研究界對於後殖民視野的本土經驗關注，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類研究側重於傳統「少數民族文學」學科中，主要做法是將後殖民批評理論的某些觀點、看問題的套路，移用於對少數族裔文學創作現象的分析中。它主要側重於從文化身份的選擇、建構，以及認同的困惑與焦慮等方面切入，來評論具體的作家、作品。當然，文化身份的問題，是「少數民族文學」中的基本問題，所不同的是，後殖民主義批評的引進，使問題的定位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少數族裔文學中的「民族意識」、「民族身份」的問題，不再是具體的「民族出身身份的確證」和不同民族文化特色表現的問題，而成了全球化語境下或與主流漢文化相對照下，邊緣弱勢族群文化的焦慮書寫與自我拯救。文化衝突性、「身份政治」^⑥的意涵被大大加強了。

在這一類研究中，馬紹璽、張直心兩位較為突出。他們對少數族裔寫

後殖民主義批評與少數族裔文學批評發生聯繫，開始得比較晚，而且總體水平也不高，多表現為對主流學界轉手的後殖民批評方法的再度轉手借用，但是它卻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強的本土當下經驗的在地性。

作有着第一手的感知，對對象本身的閱讀也較為細緻，較能深入地體察研究對象的族裔情感、訴求與焦慮；相關批評理論的引入，也幫助他們拓展了研究視野，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將或具體或整體的少數族裔文學寫作的族性自我意識的追尋，放在全球化語境甚至本土多族群文學互動的角度加以把握^⑦。另外，《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一書也值得注意，其中不少部分突破了慣常的地域文學研究，不再是「某籍」作家的簡單集中或所謂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學的比附，而是較為扎實地以文化批評等較為新銳的理論方法，對豐富、多樣的四川少數族裔當代文學，進行了比較到位的把握^⑧。

第二類研究則表現為以少數族裔文學為基礎，側重於更為開闊、更具整體性、結構性問題的考察。例如全球化、後殖民主義語境下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諸問題^⑨；「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史的重新梳理，尤其側重於揭示「少數民族文學」建構與現代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等^⑩。從事這類研究的研究者大都具有扎實的理論素養，對相關文化批評理論的把握相對也較好，而且又對少數族裔文學有着切實的第一手文本閱讀經驗，具有跨學科的優勢，因此他們的研究代表了後殖民批評理論與少數族裔文學研究結合的主要成果，極大地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研究天地，切實改變了少數族裔文學研究的傳統思路，同時也朝着後殖民批評中國化、在地化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上述兩類研究對於少數族裔文學被主流文學抑制的歷史與現狀，都有切實的認識、分析與批評，但仔細對照，兩者的立足點似乎有着較大差異。第一類研究者一般都取「少數民族本位立場」，習慣於從「實體性」的

「少數民族」本位立場上來思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民族文學」代言者的意味。而第二類研究者，則較多地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待少數族裔文學，不是簡單地去為少數族裔、少數族裔文學爭甚麼，也不是從單向性的「民族身份」出發，考察少數族裔文學寫作所傳達出的認同的困惑、焦慮等。因此，後者顯示出較強的價值「中立性」^⑪；或者更多地考慮到少數族裔身份、權利的強調，與國家整合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表現出少數族裔關懷與國家關懷的雙重性，如劉俐俐的〈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身份意識〉等。

筆者早在1996年就試圖跳出理想主義或激進主義的爭論，嘗試揭示張承志的文學創作所具有的「超越後殖民主義語境的意義」；後來，又由張承志的個案研究，進入到更為廣闊的當代少數族裔文學中，借鑒後殖民以及更寬泛的後現代批評話語，細緻地解讀有關少數族裔作家的文本，分析先鋒文學與多族群文化的關係，梳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在建構及其發展軌跡。筆者還高度注意二元對立、文化本質主義思維的危險，力圖將宏觀視野的把握與具體現象的細讀結合起來，突破少數族裔文學與主流漢族文學之間的文化壁壘，既批判主流文化界對少數族裔文學（化）的抑制與漠視，又揭示它們之間的「互文性關係」，並細緻地辨析同一族群文化言說中的差異^⑫。

二

雖然晚至1990年代後期，作為理論的後殖民批評才被引進少數族裔文學批評界，但它之於中國少數族裔文

打從195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被「有計劃地」建構的那天起，後殖民批評理論所關注的中心與邊緣、強勢與弱勢的二元結構關係，及其不平等的現代時間與空間的拓展，就植生於「少數民族」（文學）話語中了。

學卻具有「內生性」。打從5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被「有計劃地」建構的那天起，後殖民批評理論所關注的中心與邊緣、強勢與弱勢的二元結構關係，及其不平等的現代時間與空間的拓展，就植生於「少數民族」(文學)話語中了。

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話語之一，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及其學科的建構，正式開始於50年代的「民族情況」普查工作，這是現代中國第一次由國家力量將國家現代性的設計方案向整個中國的各個角落全面推進、實施的開始。從普查工作的信息流向來看，首先是政策性、命令性、學術性、精英性的「能量信息」由中央向地方、中原向邊疆、漢族地區向少數民族地區、漢族文化向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推進，然後再通過能量信息源對信息接收(邊緣)地區信息的整理、編制、改造、保存，再向能量信息的發出地返回。在文學上最直接的成果顯現，就是大量「民間文學」材料的發現，而這又直接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產生。

這種由中心到邊疆，再由邊疆向中心的信息循環，還伴隨着社會制度、經濟運作、人口等相同性質的流動。或許更為確切地說，正是這類「物質性」的中心向邊緣的擴散，構成了同類文化信息流的基礎，兩者都與後殖民批評所抨擊、暴露的殖民擴張具有一定的可對比性。而這表現在文學創作上，最直接的莫過於社會主義的內地與異域風情且落後的邊疆兩者所構成的空間結構^⑩，它對人們關於完整國家的空間想像，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不過，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所帶來的中心與邊緣的現代空間結構，具有中華命運共同體的長期歷史基礎，

絕對不能簡單等同於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後者是充滿血腥屠殺、跳躍性地霸佔、掠奪遙遠的陌生之地。儘管如此，兩者都同屬於全球現代化的進程。因此，我們無法否定中原與邊疆地區、漢族與少數族裔、漢族主流文學與少數族裔非主流文學之間，存在着抑制與被抑制、主導與從屬的性質。

當然，在新中國的頭三十年，漢族與少數族裔、內地與邊疆的關係，都被單一性地表現為和諧美好的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而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緊張，乃至矛盾，都盡量被抹去，或被轉化為先進與落後、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等不同力量之間的鬥爭。儘管如此，在「少數民族文學」的具體建構中，「民族身份」作為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仍然困擾着理論與創作。「身份的確定」並非少數族裔文學所獨有的問題，從晚清由傳統「國家」形式向現代「民族—國家」開始過渡起，民族身份、國家形式的確定，就成為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問題^⑪。

後來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階級國家」的建構，戰勝了其他路徑的選擇，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新政權的建立，並沒有自動帶來以「階級身份劃分」確定「中華民族」進程的結束，而是進一步向內陸中國、邊疆中國推進。本來用來確定單個個體、人民身份和國家性質的階級標準，是要求排斥其他標準(如種族、文化、地域、宗教等)的，可是眾多少數族群所確實擁有的諸多地域、種族、文化的異質性，又不是能夠簡單忽略與排斥的。加之受列寧世界民族平等理念的影響，新政權不得不承認「各民族」的存在，或者說，不得不設法建構起一套符合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可以涵融於中華民族之內的「少

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帶來的中心與邊緣的現代空間結構，具有中華命運共同體的長期歷史基礎，絕對不能簡單等同於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後者是充滿血腥屠殺、跳躍性地霸佔、掠奪遙遠的陌生之地。

數民族話語」。因此，無論是在社會存在還是文學建構中，都必須釐清、確定某一具體或整體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說，建構「少數民族」。

這樣，「民族身份」的確定，就具有了一般階級或人民身份確定所沒有的族裔異質性。為了盡量減弱這種異質身份可能造成的衝擊，在當時的「少數民族文學」中，身份確認問題，一方面被轉化為一般性的由「民族識別」來確定的「客觀」、「自然」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在具體寫作中將「民族性」的表現，更多地引向「民族色彩」這樣風情、觀賞性的方面，而對「民族性」表現中所可能帶來的「民族身份認同」的內容，則保持高度警惕。要絕對保證這一切都隸屬於階級性、人民性、社會主義性的要求之下^⑥。

儘管階級鬥爭的理念、美好的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想像，在當時的確極大地轉移、克服和抑制了地區、種族、文化、宗教觀念等的現實差異，建構起了完整的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認同，但是全方位、高強度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的衝突性手段的整合，卻對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族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而且，各少數族群還多承受了一重「民族性」的傷害。因此，「文革」結束後，當主流文學以「人的解放」的名義反思、批判、告別過去的社會主義文學，重新新型的個體性、個人化的文學時，少數族裔文學自然就開始了重返「民族自我」的文學之旅。

這種重返並非個別的偶然行為，而是眾多少數族裔文學的選擇。它在80年代初雖然還沒有完全與以往「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民族特色」區分開來，但作家的創作衝動、指向，在一些少數族裔文學那裏，已經明確地轉向本族群文化，立足點也已經落實

在本「民族」的價值取向上。到了80年代中期，其規模和強度大大加強，並且族裔文化的書寫與特定族群的「民族意識的覺醒」、「自在性民族身份的建構」之間的關係也更為清晰、直接。前些年的單個性的「重返民族文化」的寫作，已經成為集體性的普遍動向。到這時，「少數民族」地區（如涼山、西藏、喀什噶爾等）不再表現為以往的社會主義祖國的邊疆，而被書寫為特定「民族」的家園，成為文本、意識、宇宙的中心。這一族性寫作潮流進入90年代後，更匯聚為浩蕩之勢，所蘊含的文化衝突性也更為明顯。這大大強化了特定族群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識」的追尋和伸張。

到90年代後期，「民族性的書寫」，就走到了無法迴避的漢族與少數族裔、國家統一與地域民族主義訴求衝突的門檻。於是我們看到，一些少數族裔作家，已經不僅僅只是焦慮本族母語文化在現代化、漢化的趨勢下瀕臨滅絕，欲以對母語文化的書寫，來衝擊、反抗漢語文化霸權；同時他們還在思考，如何通過第一母語（本族語言）文化的異質性衝擊，去改造漢語，使之真正成為「少數民族」的第二母語，成為真正的中文——整個中華各民族的語言。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少數族裔作家，走上了更為激烈的、帶有相當撕裂性和種族排斥性的道路。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在50、60年代，通過他者性的文化撞擊而被抑制性、「自我遺忘性」地創生、激活。到了80年代之後，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想像與追尋，在重建「民族自我歷史」的寫作中，恢復「民族的自我意識」、尋找自身的獨立價值，並經歷了由「感傷性」的民族主義，到「運動性」的民族主義的發展^⑦；少數族裔書寫，早已

到90年代後期，「民族性的書寫」，就走到了無法迴避的漢族與少數族裔、國家統一與地域民族主義訴求衝突的門檻。於是我們看到，一些少數族裔作家，欲以對母語文化的書寫，來衝擊、反抗漢語文化霸權。

不再是簡單的文學創作，而是在相當意義上成為了「民族認同」的旗幟^⑦。

將中國少數族裔文學話語的演變史置放在世界當代歷史的框架下，我們會發現巨大的悖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二戰後世界民族解放、民族獨立浪潮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是它又在中國內部帶來了巨大的震蕩，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新的「民族性」的壓抑與抵制的關係，出現了與世界性的後帝國主義時代的後殖民文化之聲遙相呼應的情勢。

三

了解少數族裔話語中的後殖民話語的情況，還需要延伸到網絡觀察。互聯網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表達自由性與即時相互性，使得「運動性」的民族主義，在某些族裔那裏得以更為普遍展開，也促成了後殖民話語的普及化。發生在唯色女士身上的諸多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唯色女士是90年代在中國大陸獲得聲譽的藏族詩人。90年代中期之後，其藏民族意識的表達愈發強化，不僅寫出了《十二月》這類隱含着極大憤怒的詩篇，而且還以網上簽名的方式，發起反對張健橫渡錯木納湖（青海湖）、韓紅飛降布達拉宮的演出計劃。後來她因創作《西藏筆記》受到西藏作協的處分。

有關唯色被處分的消息在網上傳開後，有不少的跟貼為唯色鳴不平。王力雄先生撰寫了〈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一文，將唯色的遭遇作為中國對西藏所實施的帝國主義文化霸權進行個案分析，此文也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借用王力雄的觀點來看，本來處分唯色是為了

壓制西藏本土的聲音，是對藏族自我表達權的剝奪，但是網絡對相關消息和許多抗議性文字的廣為傳播，卻給唯色帶來更大的影響，在相當多的藏人心目中，唯色成了「民族英雄」^⑧。當然，壓制帶來反彈、強化的現象在傳統媒介時代也屢見不鮮，但那大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醞變。可在網絡時代，抑制與反彈卻幾乎同時形成。

唯色事件不過是一個較為突出的案例而已，網絡所帶來的民族主義話語的激蕩和後殖民主義觀點的播散，還有很多例子。像「藏人文化社區」所開展的〈母語與民族文化〉的討論，就非常典型。2004年5月，唯色以「德格娃」的網名向「藏人文化網」轉貼了海外藏人達瓦的文章：〈母語與民族文化：一位海外藏人評說藏人文化網〉。文章認為「藏人文化網」不過是一個錦上添花的、聊勝於無的網站，「如果將其奢望成為扮演『雪中送炭』宏揚西藏文化或傳承西藏精神的舞台，實在是過於迂腐的觀念。」這不僅是因為現實的政治控制，更重要的是一個用中文辦的藏族文化網站，不用自己的母語發言，怎麼可能弘揚藏族文化呢？該文引發了網站主辦者之一阿里狼客（旺秀才丹）相當敏感而激烈的反應。他感到很委屈，本來是不計名利地想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事，但現在卻不被人承認，甚至被視為「是使用中文寫作或表演的人」^⑨。很快達瓦的帖子和阿里狼客的回應在「藏人文化網」上掀起了熱烈的反響，許多網友先後參加進來討論，形成了一個歷時兩年（2004年5月22日到2006年8月3日）、篇幅長達24個網頁共13萬字左右的激辯。

雖然，像這種熱烈、長時間且質量較高的討論還不多，但類似的「文化」討論或言論，在網上相當普遍。

互聯網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表達自由性與即時相互性，使得「運動性」的民族主義，在某些族裔得以更為普遍性地展開，也促成後殖民主義話語的普及化。唯色事件就很能說明問題。

譬如多個網站參與的關於「紫氣東來」的討論，「維吾爾在線」的〈維族人如何與中國同步發展〉、〈一個維吾爾青年對愛國的漢族精英、對論壇君子的肺腑之言〉、〈一個漢族朋友告維吾爾同胞書〉、〈原來維吾爾人文化就這樣被曲解了——兼談刀郎文化〉等討論與文章。

由上述簡略的情況介紹已經可以說明，經由網站技術的支撐，在不少少數族裔中已經形成了非體制的屬於本族群的知識生產、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間。網上的後殖民批評話語，雖然一般來說，學理性比傳統媒介要低，但其已經遠遠超越了文學批評的範疇，真正成為了話語權、文化抵抗的社會實踐。雖然這一切遠非後殖民主義批評單一刺激所致，但它們無疑更為貼近後殖民批評的實踐性。

或許，對眾多不瀏覽少數族裔門戶網站的讀者來說，看了這裏的介紹，可能會產生「民族分裂」像洪水襲來的感覺。其實這種感覺是不對的。第一，這種恐怖之感，並不一定是因為真實情況的洪水滔滔，而是與體制對相關問題的長期控制以及主流文化對少數族裔聲音的漠視有相當關係。第二，雖然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認同的追求，之於各少數族裔來說，是普遍而共同的，但不同的族群、個體，對「民族權利」的爭取，在程度和界限上又有相當差異；而且根據筆者有限的考察，真正分裂、獨立、種族排斥性的成分，還是極少數的。第三，與許多以「漢」字為旗號的漢族網站相較，少數族裔網站則顯得非常非常的理性，「維吾爾在線」的編輯原則就很可能說明問題：「我們可以斥責政府的過失，批判國家的弊端，揭露民族的弱點，但在發表的言語裏請尊重自己的民族和祖國，這是最起碼的」^②。但

是再反觀「漢皇網」之類的網站，其大漢族主義的叫囂、對其他族群尤其是歷史上曾經與中原、漢族有過較為激烈衝突的民族的仇視、憤怒，則簡直可用瘋狂二字來形容^③。

四

後殖民主義批評在少數族裔文學那裏表現得相當廣泛，但問題也相當嚴重。表現出理論運用的簡單化，經常是後殖民批評的原則性觀點與研究對象的淺表性對接，學術跟風現象嚴重。而且總體來看，相關研究還處於學術開拓起步階段，理論套用、推論性研究常常取代「實證」性考察，真正深入切實的話語分析或知識考古性研究，還很不夠^④。不少文章都存在理論粗暴化和迴避問題的傾向，開口閉口「少數民族文學」受到主流文化霸權的壓制，但具體行文卻又迴避對壓制的具體分析。諸問題中，最為嚴重的是文化本質主義與二元對立思維。

這一問題之所以相當嚴重，一是因為在「少數民族文學」界或更普遍的「民族話語」中，文化本質主義一直就存在，人們早已習慣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二分思維；二是同類問題即便是在原生後殖民主義理論那裏，也沒能完全克服^⑤。再加之大多數人對所借用的理論資源鑽研不夠，就更容易被本質主義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所制約；三是主流學界的負面影響。從後殖民主義理論開始以「東方」、「第三世界」的名義進入中國大陸起，就被嚴重地、本質化地曲解了。這種曲解、扭曲，不僅「傳染」給了後來者，而且還被直接移入少數族裔文學界。或許曹順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網站技術在不少少數族裔中已經形成了非體制的屬於本族群的知識生產、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間。雖然它們的學理性比傳統媒介要低，但已遠遠超越了文學批評的範疇，成為了話語權、文化抵抗的社會實踐。

曹順慶先生早在90年代中期就強烈地焦灼於西方理論話語對中國聲音的放逐，呼籲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近年，他又以相同的思維慣性衝入「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界，大聲控訴「西方話語、漢族話語、精英話語三重霸權」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壓迫」^{②4}。或許曹先生自以為他的「滿族身份標示」，就可以把自己從所謂的「漢族話語」、「精英話語」中解脫出來，轉眼間成為「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代言人。姑且不說其中的自以為是和僭越性，所謂「西方—漢族—精英—少數民族」四重性的劃分，本身就是非常武斷、粗暴的。

「話語」無論是在福柯 (Michel Foucault)，還是後殖民學者那裏，都不是簡單的某個民族、階級所擁有的天然的言說系統，而是高度含混、充滿矛盾、衝突的關係結構。薩依德 (Edward Said) 所討論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並非鐵板一塊的殖民主義觀念，更不是所謂第三世界民族的「東方話語」；而是由西方他者之看，所建構的包含着「看」與「被看」雙方的關於「東方的言說」；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所一再思考的「屬下」是否能夠說話的問題，也並非只是宗主國的壓迫所導致殖民地人民失聲的問題；巴巴 (Homi K. Bhabha) 的「仿真」、「第三空間」等概念，也說明了話語的高度混雜性。

可是在曹先生那裏，所謂「某某的話語」，完全變成了直接來自於民族、族群、社會身份的東西，其強弱之分、壓迫和被壓迫的簡單二元對立性關係之言說，也就替代了對話語本身的高度複雜、曖昧性的分析。其實，這與其說是後殖民理論的運用，毋寧說是改頭換面的階級出身論和路線鬥爭的再表演。「話語」被實質性地

變成「階級路線」，而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這一並不準確的漢譯^{②5}，也經由簡單化的再度闡釋，幾乎被完全化約為強權勢力對弱小族群或弱勢文化的壓迫。

這種本質化、簡單、粗暴的「民族關係」、文化關係的言說，雖然先行於漢族主流批評界的中西「外部關係」的討論，但其向內部「民族關係」的延伸，卻具有更大的理論與現實的危害性。它想當然地指認了漢族與少數族群、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不平等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但是卻又不去進行細緻、審慎的分析，而是語焉不詳、迴避問題。這樣做的結果，既不可能幫助人們真正深入地了解、認識複雜的中華民族關係，認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也不可能真正揭示主導與從屬、強勢與弱勢、壓抑與抵抗性的複雜的話語關係，因此也就談不上對其真正地解構或削弱。不僅如此，雖然持論者的本意或許是要通過對主流話語的批判，發出被長期抑制的少數族裔的聲音，促進中國各族群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與交融，但其簡單、粗暴的「奪權」、「反抗」思維，恐怕只會導向更大的民族仇恨和衝突。

中國從晚清開始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雖然內部一直存在着分裂、排斥性的因素，但是主導潮流，尤其是以漢語為表達工具的思想、觀念，則指向完整多族群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構成了現代中國歷史最核心的價值與存在，這也正是古老的中國雖經眾多災難卻沒有分裂並發展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上述後殖民理論的引借和近三十年來少數族裔文學的主導思潮則與此核心價值相悖，具有相當的「逆向民族主義」^{②6}的性質。如果再聯繫到海峽對岸的「台灣

從後殖民主義理論開始以「東方」、「第三世界」的名義進入中國大陸起，就被嚴重地、本質化地曲解了。這種曲解，不僅「傳染」給了後來者，而且還被直接移入少數族裔文學界。

主導價值」、中國大陸知識界中某種隱約存在的為憲政制度而解中國化的價值取向^②，以及國內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那麼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可能就不只是某些人所擔心的「憤青式」的國家至上的「激進民族主義」吧。如果說「激進民族主義」可能阻礙中國的民主化建設，阻礙中國新一輪現代轉型的順利完成的話，那麼「逆向民族主義」的思潮所具有的解構國家的力量，不僅會持續增大，而且很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被激化，從而破壞國家的和平、穩定與民主化建設。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正面臨着巨大的國家認同的挑戰，一切關心國家命運的知識份子，都應該予以高度的重視。對於漢族知識份子來說，要自覺地檢討、批判、克服漢族中心主義的傲慢，去關心、傾聽弱勢族群的聲音；而對於少數族裔知識份子來說，在借鑒後殖民批評理論時，可能需要思考這樣一些基本問題：後殖民主義理論是否應該成為中國少數族裔文學寫作及批評的理論綱領？後殖民批評之於中國的情況是否有效？完全有效，還是部分有效？在甚麼意義上有效？如果我們對這類基本問題沒有審慎的思考，就可能既擺脫不了理論的簡單套用與誤用，無法真正進入本土「民族話語」的深層空間，更不可能對新型中華民族認同的建構，做出真正的貢獻。

後殖民批評之於中國的情況是否有效？完全有效，還是部分有效，在甚麼意義上有效？如果我們對這類基本問題沒有審慎的思考，就可能擺脫不了理論的簡單套用與誤用，無法真正進入本土「民族話語」的深層空間。

註釋

① 後殖民主義理論本身就結合了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民族主義等諸多理論元素，有着高度的理論混雜性，被引進中國後更出現了諸多誤解與亂用，所以本文並不是以「確切的」後殖民主義理論來確定研究對象。對象所及不僅包括直接與

後殖民批評相關的文字，也包括那些更直接地從全球化角度論述中／西文學(化)和漢族／少數族裔文學關係的文字，甚至也包括某些民族主義視角的相關文章。關於後殖民話語在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情況，已被多人考證，此處就不再具體指證。

② 本文所指的「主流」與「邊緣」，基本就是相對於漢族與少數族裔而言的。

③ 例如葉舒憲：〈知識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性知識」與「再闡釋」〉、陶東風：〈全球化、文化認同與後殖民批評〉，載王寧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67-86、340-58。

④ 按照一般習慣，此處應該用「少數民族文學」這一稱謂，但為了盡量減少「民族」一詞所包含的「民族—國家」與「文化族群」兩種不同層面含義的混淆，本文將盡量不在後一種意義上使用「民族」或與「民族」一詞相聯的詞語，即便非用不可，也將加引號以示區別。

⑤ 筆者寫於1996年的〈超越「後殖民主義」語境的有益嘗試〉(《中國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頁11-12)，可能是中國大陸學界第一次將後殖民批評與本土「少數民族」文化身份直接聯繫起來思考的文章。不過以習慣上所指的少數族裔文學研究領域論，後殖民文化批評被引入少數族裔文學研究，或許是在1998年。兩篇標誌性的文章是：徐新建：〈西南的「話語」——關於「中心」與「邊緣」的一種思考〉，《中國比較文學》，1998年第2期，頁51-59；羅慶春、徐其超：〈從「文化混血」到「文學混血」——論彝族漢語文學的繼承、創新、發展〉，《天府新論》，1998年第6期，頁78-81。筆者根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統計，將後殖民理論運用於少數族裔文學研究的文章，1998年有3篇、1999年有4篇。進入2000年後有上升的趨勢，2000、2001兩年就有約10篇，2002至2006年約達40多篇；發表文章的期刊從文化中心地區到邊遠師專院校一應俱全。另外，2004、2005年兩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

的討論，也為後殖民批評的相關話題所主導。

⑥ 參見劉俐俐：〈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身份意識〉，《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頁47-55。

⑦ 例如馬紹璽：〈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認同問題〉，《民族文學研究》，2001年第2期，頁38-40；〈景頗族詩人農宏詩歌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認同關係〉，《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130-34；張直心：〈「漢化」？「歐化」？——少數民族作家漢語寫作的文體探索〉，《民族文學研究》，1998年第4期，頁35-41。

⑧ 徐其超、羅布江村主編：《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⑨ 例如劉俐俐：〈後殖民主義語境中的當代民族文學問題思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34-38；姚新勇、毛轟：〈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民族敘事——以《紅河谷》為例〉，《暨南學報》，2004年第4期，頁80-86；馬紹璽：〈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認同問題〉，頁38-40；馬麗蓉：〈論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的民族性〉，《東方論壇》，2002年第4期，頁78-82等。

⑩ 參見呂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國家學術與現代民族國家方案〉，《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頁3-9；姚新勇：〈追求的軌跡與困惑——「少數民族文學性」建構的反思〉，《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1期，頁15-24；李曉峰：〈論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發生〉，《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1期，頁59-65；巴莫曲布嫫：〈「民間敘事傳統格式化」之批評——以彝族史詩《勒俄特依》的「文本逐錄」為例〉，《民族藝術》，2003年第4期，頁39-45；2004年第1、2期，頁18-26、32-40等。

⑪ 如徐新建：〈西南的「話語」〉，頁51-59；〈當代中國的民族身份表述——「龍傳人」和「狼圖騰」的兩種認同類型〉，《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4期，頁107-11。

⑫ 參見姚新勇以下文章：〈文化身份建構的欲求與審思〉，《讀書》，2002年第11期，頁52-58；〈紀末的焦慮：知識界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認同言說的反思〉，《暨南學報》，2003年第3期，頁81-87；〈邊疆的策動：先鋒敘述中的邊疆文化〉，《民族文學研究》，2003年第2期，頁85-92；〈溫暖的家園與重構的挑戰——彝族現代詩派論〉、〈朝聖之旅：詩歌，民族與文化衝突——轉型期藏族漢語詩歌論〉，學術中國網，www.xschina.org/show.php?id=8398、www.xschina.org/show.php?id=10564；〈被綁架的「民族英雄」——關於唯色事件的思考〉，《作家》（香港），2005年第42期，頁65-75；姚新勇、劉力：〈「歸真」、衝突與和諧——兩部長篇的多重文化意蘊分析〉，《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64-70；〈多樣的女性話語——轉型期少數族文學寫作中的女性話語〉，《南方文壇》，2007年第6期，頁33-36；〈虛妄的漢詩〉，《揚子江評論》，2007年第6期，頁79-84等。

⑬ 其最簡明的模式就是「北京—邊疆」結構。這在50、60年代一系列的「少數民族詩歌」或「少數民族題材」作品以及舞蹈歌曲中，都表現得非常明確。

⑭ 美國學者菲茨傑拉德（John Fitzgerald）就專門探討了現代中國歷史中三種不同的建構「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方案，即梁啟超的「公民方案」、孫中山的「種族方案」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方案」。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56-85.

⑮ 當年馬拉沁夫的《茫茫大草原》所引起的爭論與修改，就很能說明問題。參見李曉峰：〈論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發生〉，頁64-65。

⑯ 湯森（James Townsend）討論了民族主義的三種形態：「學說或觀念系統的」、「政治行動或運動的」及「情感的」民族主義。從總體來看，由「新時期」以來少數族裔寫作所表

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基本都是「作為情感、意識或心態性的東西，主要側重於表現個人對於其所屬的民族和傳統的感知與忠誠」。雖然說作為各不同族群和個體的文學性寫作，並不容易形成明確的理論性的學說和系統的觀念，但如果進行概要性的分析，也不難從許多少數族裔文學寫作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一致性。比如對於本族群傳統的追懷與失根的困惑和焦灼，對於族群文化空間的民族歸屬性的重新建構等等。甚至連一些基本意象的設置，不同族群的寫作都會表現出相當的一致性（例如彝族、藏族和滿族的一些詩歌）。至於說作為明確民族獨立訴求的、建構自主政治共同體的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並沒有形成，至少沒有公開系統地表現出來。但是，如果我們不是過份看重直接的政治訴求或行動，而從族性認同、歷史追懷、民族意識表現的強度與規模來看，說（一些）少數族裔寫作已經達到了「政治民族主義」的程度，也並不為過。而且如果再將其他一些非文學想像性的觀念表達（尤其是網絡上的）結合起來觀察，其「運動性」的民族主義性質，就更鮮明了。參見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Nationalism*, 7-8。

⑰ 關於「新時期」以來少數族裔文學創作的演變情況，參見前面所列姚新勇、李曉峰、徐新建、馬紹璽等人的文章；另請參見關紀新、朝戈金：《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

⑱ 藏族青年詩人嘎代才讓在新浪網上做過一個你最喜歡的西藏當代作家的調查，結果唯色僅落後於伊丹才讓位居第二。另外，許多藏族年輕作家，都專門寫詩，表達對唯色的敬仰。這對於一個年僅三十多歲的年輕作家來說，的確非同尋常。

⑲ http://bbs.tibetcul.com/dv_rss.asp?s=xhtml&boardid=16&id=558&page=1

⑳ 曾刊於www.uighuronline.cn/bbs/dispbbs.asp?boardID=42&ID=12352&page=3。

㉑ 關於網絡技術對少數族裔文學影響的更為全面的分析，參見姚新勇：〈網絡、文學、少數民族及知識—情感共同體〉，《江蘇社會科學》，未刊稿。

㉒ 相較之下，美國學者達恬地（D. Dayton）的研究則要細緻、深入得多。參見D. Dayton, “Locating the ‘Minority’ in Multicultural China: Shama’s Poems of Ethnic Nostalgia”, 2005（根據彝族詩人沙馬所傳文本）；“Big Country, Subtle Voices: Three Ethnic Poets from China’s Southwest”, 2006, <http://ses.library.usyd.edu.au/bitstream/2123/1630/5/01frontDayton.pdf>。

㉓ 例如穆爾—吉爾伯特（B. J. Moore-Gilbert）著，陳仲丹譯：《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就對薩依德、斯皮瓦克等人理論中的此類困惑做過分析。

㉔ 曹順慶：〈三重話語霸權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第3期，頁5-10。

㉕ “Hegemony”一詞，起初的漢譯是「霸權」，後來逐漸較多地被譯用為「領導權」。應該說後一種譯法，比較接近葛蘭西所意味的「意識形態主導權」，而非簡單的壓迫性、強權性的「霸權」。

㉖ 它既與民族國家的整合相背離，拆解着過往的「北京—邊疆」的國家想像，同時又追求着異質性的民族認同，所以是與國家性的民族主義相背的「逆向民族主義」。

㉗ 如劉軍寧：〈為甚麼大一統是亂世之源〉（《南方週末》，2008年1月23日），就透露出此種資訊。而薛湧的〈從中國文化失敗看孔子的價值〉（《南方週末》，2008年1月10日）一文，則可以看成是隔海之呼應。

姚新勇 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及中國多民族文化關係研究。